

天津是美食之都,此言不谬。我不是美食家,也没有学过烹饪,太高级的宴会没有见识过,但一般的家庭饭菜,自幼时就见到过一些。老话说,人老了,新事记不住,老事忘不了。近来看了一些有关吃的文章,一时兴起,就想动动笔,写一点天津的吃。

早 点

先说早点。天津西北角本来就是普通百姓聚集的地方,天津人勤劳,没有人“偎窝子”贪睡,天不亮,就打破窝里爬出来,奔码头上跑,到码头抢个号儿,上船背大麻袋。从文昌宫拐进西北角,那早点铺、小摆摊,一家挨着一家,档次却不一样。顶级的豆腐房里面干干净净,档次低的豆腐房里有一个大石磨,一头驴被蒙着眼睛围着磨盘拉磨,里面的味道可想而知,好在人们都是来吃早点的,坐不了几分钟,吃完就各奔一方了,谁也不会计较。

若有贵客进来,伙计自然请到离石磨远一点的桌前,贵客也知道要消费得高一些,便点了高级套餐。豆腐房并没什么特供食品,最高级的套餐就是一张豆皮儿。挑豆皮儿是一桩辛苦活,两个伙计蹲在豆浆的大锅旁,一手摇着扇子,一手将豆浆锅上结成薄皮的豆皮儿挑出来,挂在高高的竹竿上。等豆皮儿凉了送到客人面前,再加一根油条。这样一份早餐要多少钱?读书的学生怕是得望洋兴叹了。

天津日西南角、西北角,都有一家大豆腐房,里面几十张桌子,凡是来吃早点的人,都不会在豆腐房里久坐,你来我走,时时都有空座儿。客人进来,伙计引到座位前,由你点吃的,这几家豆腐房食物繁多,光是豆腐就有不下十种,豆浆、豆腐脑,还有烩豆腐、老豆腐等。学生早晨去上学,从家里带上半个大饽饽,坐到桌前,喊一声,小碗烩豆腐大碗盛,立即就有伙计把一只大碗盛着的、只有小半碗的烩豆腐送到学生面前。学生呼噜呼噜吃下去,然后站起身走到门口,把五分钱交给伙计。伙计收下钱,拍拍学生的脑袋瓜子,嘱咐一句:过马路留神电车。学生答应一声,背着书包跑了。

规 矩

说那学生吃过早点,出门时,伙计拍拍学生的脑袋瓜子,还要嘱咐一句。这绝对是豆腐房的规矩。老人来吃早点,出门时,伙计一定问一声:我送你老回府?老人说声,谢谢。见是个年轻伙计,老人会拍拍伙计的脑袋瓜子,说:好孩子,忙完了,跟伯伯逛鸟市去。新从山东过来的人说的蚰蚋,个个愣头青。说完,彼此微微一笑。伙计说:您老慢走。

别拿这类小事不当事。这样的豆腐房生意就好。早晨学生上学,家长会嘱咐孩子,上那家豆腐房去喝豆腐啊。老人早晨出门,家里人也是让老人进这家豆腐房。见到客人们光临,豆腐房自然是热烈欢迎了。

天津说吃（五题）



林 希

天津的早点五花八门,西北角成了闻名的早点一条街,北京的朋友赶火车直奔天津西北角,就为来吃一套煎饼果子。如今,煎饼果子已经遍布全国,人们却说,只有天津的煎饼果子味儿最正。其中的道理,就是天津煎饼果子规矩,纯绿豆面的,掺点儿白面也一定不超过比例。果子炸得又香又脆,面酱、酱豆腐味儿纯,若要举行煎饼果子大赛,天津绝对是第一名。

锅巴菜更是天津有名的美食。过去,我家小区门外的市场上,有一位大姐专门卖煎饼,她向排队买煎饼的居民介绍,这煎饼,是她老爹摊的。她老爹原来是大福来摊煎饼的老师傅。别人摊煎饼,老钱儿那么厚,厚不好吗?大姐解释,煎饼厚了,不香,摊煎饼不同于烙大饼,尤其是做锅巴菜的煎饼,烙厚了,放进卤儿里就成了面片儿了。

市场里的人问我,您老买煎饼干嘛吃?我说做锅巴菜。小贩们笑了,锅巴菜,那可是一门手艺,打锅巴菜卤更是家传的手艺。看来,做任何事都要讲规矩。

开饭馆

看过一部戏,说是有一个前王爷家的浪荡公子,家里存着北京一家大饭庄的一张鸭子票。老王爷归西,人家饭庄的鸭子票早就登报作废了,这公子还来捣乱。最终,公子一怒之下,把饭庄给砸了。

在饭馆,特别是在皇城内,一个浪荡公子绝对不敢如此张狂。饭馆那可是江湖生意,得有黑白两道的后台,无论多高的官位,吃饭就是吃饭,来这里摆官架子,饭馆不买账。一份红烧海参就得是半斤?我偏要一斤。掌柜的再来一摆手,对不起,别人一份海参是多少,你也得是多少,没吃够,再要一份,给两份菜钱。

饭馆角落里张桌子,坐着几位官面儿的差役,怀里揣着“王法”,也就是一根小绳,代表王权。只要在你胳膊上绕一个套,就把你带进局子里去了,有罪没罪,先打四十大板。嘿嘿,局子里可不是温良恭俭让的地方。

除了官面儿上的差役,饭馆都有几名伙计练过拳脚,遇有吃

饭不付钱的恶棍,鸡鸭鱼肉吃饱了,抹抹嘴站起身,付钱?记到乾隆爷账上。立即有人过来,一拳,就让你吞进肚子里的东西吐了出来。为什么饭馆每天能平平安安营业,靠的就是黑白两道的保护。

有一种说法,客大欺店,店大欺客。这只是一说罢了,再大的客也欺不了店,再大的店也欺不了客。你买卖大,只卖燕翅大席,我们吃不起,拐个弯儿,炸酱面,两便了;你若只卖炸酱面,爷今天有钱了,给我摆一桌燕翅大席,对不起,爷,您往那家请,我送您过去。瞧,多和气。

报菜名和结账

《报菜名》是相声名段,大家都听过。其实,旧时饭店,每一位服务员都能说说这段相声。

餐厅服务员,过去叫饭馆伙计,还有一个带有歧视性的称呼,叫“跑堂的”。跑堂也是一门技术,过去饭店学手艺,一门是学习烹饪,也就是厨师,再一门就是学习跑堂。那时候,饭店跑堂可没那么容易,首先要眼力好,一眼能看出顾客的社会层次,就是日常说的“看人下菜碟儿”。旧时代,没有看人下菜碟儿的本事,你就休想在社会上立足,谁也不会用你。来了尊贵人等,你一般人对待,砸了生意事小,弄不好就是一场“官司”;来了平常人等,你当尊贵人士对待,平常人也承担不起,以为你是想敲竹杠呢。

旧时饭店,没有印制好的菜单,更不像现在将每样菜品拍成图片,或是制成样品,任由顾客挑选,服务员跟随在顾客身后,顾客点一样菜,服务员在小本本上写几个字,颇有秘书跟在领导身后,将领导指示一件件记下来的派头。

饭店里,顾客到了,先让座,敬茶、摆餐具,然后站立一旁,观察顾客是哪路人等,然后恭恭敬敬地询问,您用点儿什么?

顾客如果只说个范围,譬如“随便吧”,那就是随便吃点,伙计便开始报菜名了,从肉类开始,这个肉,那种肉,一连报上几十种肉菜菜名,客人若没有点菜就继续往下报。鱼类、煎炒类,光爆三样就有五六种,一连报上百种菜名,而且中间不能停,不能进唾沫星,那真和相声演员一样,一点儿褒贬也挑不出来。

学习报菜名,至少也要几年时间,一两年的学徒只能扫地、洗盘子,根本上不得店堂。用心学徒的孩子,都是白天扫地,洗盘子,晚上蒙在被窝里叽里咕噜地练习报菜名。

除了报菜名的外,还有一个绝活,就是需练多少年的一门技术:结账。那时候没有计算器,顾客吃饭时,你不能拿着本本一笔一笔地记下来。顾客酒足饭饱,一扬手,跑堂的过去,先询问:您不再用点儿什么了? 顾客说:结账。

好了,这又要看伙计的本事了。这时候,跑堂的一边收拾碗、碟,一边唱出每一道菜的价格,再一样菜、一样菜地加起来,

报的副刊的单元里,表达对几位前辈新闻人的崇高敬意。

2015年,天津日报社拟筹建郭小川、孙犁、梁斌纪念馆,初步选址在静海县,此事列入了县政府工作报告。之后,团泊镇还公布了打造团泊洼地区文化特色的初步设想。报社为此成立了三个筹备小组,我领衔难度最大的郭小川组。筹备小组迅速开展相关工作,远赴白洋淀等多处实地调研,我带着组员前往北京,登门拜访了郭小川的夫人杜惠。时年已经九十多岁高龄的杜惠老人,当年同郭小川一起参与创办《天津日报》,同样是我们的老前辈,她非常赞同天津日报社的创意,不仅赠送有关研究书籍,还亲手交给了我一条郭小川在团泊洼“五七”干校曾经穿过的蓝布老棉裤,令我大受感动。

孙犁写作《伙伴的回忆》的时间落款是1977年1月3日,巧的是,我刚好是在2日那天上午,来到孙犁先生家,送去报社的两份干部履历表,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人,当然,那时的称呼是“老孙同志”。转天,孙犁写好了这篇动情的散文,还另为郭小川写了一篇悼诗,后又做过补写,仍是意犹未尽,在写作《颐和园》时,再次补记遗漏的情节,可谓战友之情深矣。

十年动乱之后,孙犁先生恢复写作的第一批作品,以回忆性散文为主,缅怀当年的老战友,感念战争年代结下的至深友谊,对于朋友的真诚相助,一生不忘。这些散文篇篇精彩,章章感人,作为晚辈,我是当作范文来阅读和学习的,并运用到报纸副刊工作之中。我对郭小川的了解和热爱,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孙犁的文字,它们教会我如何传承党报编辑的优良传统和作风,做一个称职的好编辑。

从这篇《颐和园》中,引出这样多的往昔之情,我深感欣慰,这是时间的积淀与情缘的厚积。感谢重读“芸斋小说”,让我重温旧情,再唤温情。

读到《修房》时,同样掀起我心中的波澜,想起许多不曾被遗忘的往事。《修房》写的是1976年唐山地震后,报社组建了修房小组,专职修缮职工的危险住房。派到孙犁家的修房人员,有一位叫王兴,真正干活的也只有他。小说介绍了王兴的基本情况,看来,他们之间是做过交流的,起码是有着共同语言。王兴原先资质很好,北京大学毕业,在报社做理论宣传工作,因“犯了大错误”而被调离本岗,“文革”开始仍需整日劳动改造。孙犁其时也是挨批离岗,身陷“遭逢”,地震又使得住所毁坏,面临着困境。王兴是知道孙犁的,他们曾同为难友,更是报社编辑部同事。王兴的惻隐之心,实则是出于人的善良本性。“他给我干活,不言不语,实际上处处为我着想。比如,怎样叫人们多干点活呀,怎样找点好木料呀,怎样把活做得细致一点,坚固一点呀,等等。”孙犁对王兴怀有好感、同情。“在牛鬼蛇神学习班里,他从不轻易批判、揭发别人,更不用说陷害别人了。他只管自己好好地去劳动,去改造,去学会各种技能。”这可能就是孙犁褒奖王兴的深层原因吧。

小说中的王兴,现实生活中叫王瑞兴。落实政策之后,他离开了新闻单位,被调到市委的一个部门工作。1983年,他得知孙犁在作品中写到了他,辗转找到原刊报纸《羊城晚报》,读过之后十分激动,当即复印报纸永久保存。《孙犁全集》出版之时,他买回一套以示对孙犁的敬意。在之后的岁月里,王瑞兴满怀感激地去看望过孙犁,给老人拜年,孙犁患病期间他还曾多次前往医院探视。孙犁病逝,王瑞兴写了文章《挨头始相识 修房结友谊——深切怀念孙犁同志》,讲述当年患难中的相处。此文写得极为质朴感人,可作为《修房》小说的辅读。

我这样详谈《修房》,是因为我也曾与王瑞兴有过短暂的共事。那是从多伦多道孙犁家撤出后,王瑞兴又被派到宁夏路宿舍院,而此,我也从报社排字股抽调出来,参加报社抗震救灾抢险队,加入

速度要快,顾客没有时间等你,而且要准确,绝对不能少算一样菜,更不能多算一分钱,那本真是用文字无法描述的。一口气唱出都是什么菜、几寸碟、多少钱,有时还是大席,十几样菜,外加酒水与主食。伙计的眼神儿要好,看得准确、算得清楚,那也是饭店的一道风景。

这种结账方式,现在是绝对看不到了。你点好菜,大堂那里的电脑屏幕上就显示出菜名,同时标出价钱。你刚说买单,小字条就送上来了,真是与人方便,与己也方便,不怕你查,分文不差。说来说去,还是科技进步了,人也变呆了。

手 艺

厨师卖的是手艺,而且要师出名门,大饭庄出来的身价就高,小饭铺则降了一个档次。和厨师们一起用餐,老厨师们爱指指点点,一份菜送上来,看一眼,用筷子夹一点,品尝滋味,说,你把这道菜的厨师给我请出来,半路出家的就免了。那是看出门道来了。

太高超的厨艺没有见识过,听老辈人说,天津一家大饭店的一位名厨最拿手的一道菜是“扒鸭子”。那鸭子做好后,一根骨头没有,什么手艺?收拾鸭子时,从后面开一个洞,厨师把手伸进去,将鸭膛里的骨头都掏出来,而且不能伤着鸭子皮。我也做过功课,没门儿。若是我也能行,人家厨师干嘛去!

老食客去大饭店吃饭,进门先问:老四来了没有?回答:在后面候着您呢,往里面走。若是老四家里有点急事请假了,就说:老四留话了,刘爷要来了,让徒弟上灶伺候。能出来伺候刘爷的,也非等闲之辈,一定是老四的那点儿看家本领,徒弟也拿得出来。

拿手菜,见过一道“扒鱼脯”。那鱼做好后,一根骨头和鸡汤放到锅里,不使用任何工具,就是一只手握着火勺在火上转,出菜时,松软的鱼翅一丝不乱地盘在里面,客人用筷子和着调羹吃,美味无比。

还有公馆菜。所谓公馆菜,就是租界权

贵人家私人厨师的拿手菜。公馆菜讲究的是个气派,一桌子客人由一个佣人伺候,上菜时先围着桌子走一圈,然后帮助客人分菜,中间倒酒、续茶,无需客人动手。而且很讲规矩,袖口要放下来,鞋子要全新的,毛巾要第一次使用的,至于菜品嘛,要的是功夫。

譬如,清炖狮子头,肉馅在手里倒一百次,我见识过,不过偶尔,和家里倒两三次下锅的狮子头没什么区别。倒是另有一道公馆菜,叫“刀鱼脯”。春天,刀鱼上市,天津人借钱吃刀鱼,要的是一个鲜。一般家庭烧刀鱼,以煎刀鱼为多,有一老财家,家里的厨师有绝艺,每年都请亲朋吃一次“刀鱼脯”。听说那厨师手艺非凡,买来刀鱼,去鳞、剖腹、洗净,使刀背刮成泥,清水淘去鱼骨后,再调浆,用清油炸制成鱼脯。小孩子只给一块,吃过,感觉很酥很脆,反正不如红烧肉好吃。

孙犁先生的“芸斋小说”,自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以来,广受文坛赞誉,评论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,可谓影响深远,至今仍受到读者和研究者的高度关注。我读这组系列小说,也是始自那个时期,也曾经想要写一篇读后感,却因某种原因,竟然搁置了很多年,当年记下的一些所思所想,字迹都已经变得模糊了,但文章的题目,却一直牢记在心里。

每年参加读书活动时,我都会向与会者讲到孙犁。在我的主题分享中,报纸副刊、读者与作家、孙犁作品,每一次都是关键词。去年从活动现场回来,拿起那部摆在案头的孙犁《芸斋小说》,当初阅读它时的情景,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

这部《芸斋小说》,是1990年1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,1991年4月,孙犁先生题签后赠我,被我视为具有纪念意义的珍藏本。每当看到老人那熟悉的钢笔字“曙光同志正”,我便会重温一种亲切感,在我不多的存书中,这是比较珍爱的一部赠书。《芸斋小说》的封面为深蓝色,36开本,164页,定价仅为2.10元,因为出版时间较早,印数也不多,现在已是图书市场非常珍稀的一个版本了。也正因为这部书出版时间早,出版社在编辑此书时,孙犁的“芸斋小说”仍在创作之中,所以在结束时,只收入了已经发表的三十篇作品,其后的作品便归入到其他类别之中。

在过往的若干年中,孙犁的作品不断出现新的编著,仅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例,2004年7月出版的《孙犁全集(十一卷本)》,收入“芸斋小说”三十一篇,2023年10月新版的《芸斋文丛(三卷本)》,《芸斋小说》卷中的“芸斋小说”仍为三十一篇,但收入了《心脏病》《忆海读(易)》《无题》,原人民日报出版社《芸斋小说》中的《亡人逸事》《玉华婶》等篇,则被归属到了其他类别之中。

孙犁创作的“芸斋小说”,始自1981年,首发为《鸡缸》《女相士》《高跷能手》等篇,止于1991年的《无题》,前后创作周期接近十年。这样一个时间跨度,对于一位作家来说,特别是开始进入老龄的作家,常常会发出创作思路上的改变,比如,思维的变化、想法的变化、心态的变化,甚至社会环境的变化,都会使作家改变原有的创作构思,从而终止或变更原先的整体构想。所幸的是,孙犁的“芸斋系列”小说,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,从作品发表伊始,直至终笔,基本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之下,写一篇发表一篇,未曾遭遇过大的阻力,这使得“芸斋小说”保持了作家的创作初衷,也保证了系列创作的完美收官,展现出了特有的艺术品质和艺术魅力,使之成为孙犁文学著述中的一束奇葩。

从首发的几篇至收笔的最后一篇,读者看到的是作家贯穿始终的气脉,均匀而饱满的气韵,每一篇都独具味道,这很难得。当然,收笔之作《无题》,给人以苍凉、凄寒之感,读来心情不免沉重。这篇小说文字最短,却意味深长,概括了五味杂陈的人生之旅,令人感慨。1993年年初,孙犁在致友人信中,再一次提到“不再写作”及身体状况欠佳。据此可知,那篇《无题》实际暴露出了作者的一种心态和某种预感。《无题》发表于1991年8月30日《新民晚报》。1993年5月,孙犁终因病势加重,在天津日报社等各方的极力动员及劝说之下,住进医院接受治疗。第一次手术非常成功,时任天津日报社社长的邱允盛为此著文《孙犁就志》,对诊治全程做了详尽记载。此后,孙犁病愈出院,经过调养又慢慢恢复写作。稍后,友人来访时感觉到老人明显消瘦,情绪也不佳,对病情有些悲观。1997年、1998年因病情发作,又再次住进医院……

这期间,我曾两次陪同文坛友人前往医院,看望病中的孙犁。病床上的老人一改我心目中的原有形象,消瘦、无望,眼角溢出泪滴,令人心痛。从医院回来,我难过了好些天,心绪难平,发誓今后再不去医院探视病人,这种痛苦实在难以承受。那时,我们文艺部的编辑,都很关心

孙犁的病况,希望老人能再次战胜疾病,继续写作,不断有新作发表。回过头来再看《无题》,这既是“芸斋小说”的终篇,也似乎是作者借小说中的人物“他”之口,对写作生涯的告别。这是一位作家内心的挣扎,对文学放不下的痴心与不舍,是孙犁创作生涯进入晚期或临近终期之时,内心的一种灵魂告白。

像结束了战争年代的戎马岁月,和平时期的生活相对安定,孙犁先生可以动笔写作孕育已久的长篇小说《风云初记》一样,经过十年动荡,作家痛心疾首,回想起自己一生的经历,有了太多的反思与情感的积淀,从写作时间可以看出,“芸斋小说”是从那个特殊时期入笔,有近十篇的内容,直接描写动乱年代中的人和事,是“我”的亲身感受,入骨入心。如《鸡缸》中那个姓钱的门卫,《女相士》里的女相士,《高跷能手》写到的李姓“棚友”……都是在那个特殊的时间段,孙犁“发现”了他们,将这些人扭曲的人格、变态的言行,甚至在绝望之中窥得的一点光亮,都写进了小说里,作家对他们的印象太深刻,描摹入微,映现出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,以及“我”对正直、自由、正义的渴望。

我读“芸斋小说”,常常会深陷作品的意境之中,如同读孙犁其他作品一样,这时候,往往便会忽略作品本身的体裁,散文、随笔、诗歌及书简,都会带给我审美上的享受。读“芸斋小说”也是这样,只要读进去就模糊了体裁所限,第一印象也并未提示这是一篇小说。当作散文来读感觉也很好,一是素材多来自身边的真人真事,二是喜欢孙犁的语言,小说、散文有着共通的韵味。

孙犁的“芸斋小说”,除了少量发表在文学期刊上,绝大部分都登载在报纸副刊上,且用的多是“芸斋”“孙芸夫”等笔名。这些“芸斋小说”无一例外地投给外地,一篇也没有发表在自家报纸上,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隐情吧?现在细想,原因大概有三:篇幅都很短小,适合报纸刊发;期刊发稿太慢,不如报纸见报快速;因是写到熟人熟事,唯恐引发不必要的误会。这三点我认为可以是可信的,尤其是第三点,他老人家怕找麻烦,“芸斋小说”多是取材于现实中的原型,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,那些熟悉或相识内情的人,看过小说之后,有时会按图索骥,“找到”现实生活中的那些“真人”“真事”对号入座。据传,天津有一家期刊,曾想转载一篇“芸斋小说”,但因小说写的是本地的人和事,最终还是被孙犁婉拒了。

当年,《天津日报》文艺部订阅有多种期刊和报纸,每天下午,邮局都会送来当天的报纸,每当看到“大地”“花地”等报纸副刊上,出现了孙犁的名字,我们都会将报纸抽出来,先睹为快。虽然“芸斋小说”用的是笔名,但我和同事们都能看得出来,大家抢着来读,见到一篇读一篇,刊发在其他报刊上的也会第一时间找来阅读。“芸斋小说”从初发时就颇具影响,越往后影响越大,逐渐形成了“芸斋系列”“芸斋现象”。其间,有不少评论者撰写文章,从思想性、艺术性等方面,从人性角度、社会变迁与历史层面,对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。直至后来,“芸斋小说”在文坛形成影响,孙犁先生便集结出版了一部《芸斋小说》。

我那时从评论者的文章中,得到过不少启发和新识,而从作品那熟悉的文笔中,还能另外读出一种亲切感,这使我长久地感动、留恋在文章的字里行间。这种有别于他人的感受,一般读者不会读出

来,完全是我独有的一种个人经历使然。不管是当作小说看,还是作为散文读,都会从作品中“看出”或“找到”一些熟人、熟事,并随之产生联想。

例如,在《颐和园》一篇中,孙犁写了两位老友H和G,前者是侯金镜,而后者就是郭小川了吧。1977年1月3日,孙犁写了散文《伙伴的回忆》,内含《侯金镜》和《忆郭小川》两题,因当时形势所限,作品刊发时已是删减了不少。1978年除夕,孙犁为编辑近作,特写了一篇《删去的文字》,恢复了原先的一些文字。同在1977年1月,孙犁还创

我与“芸斋小说”



宋曙光

作了《诗二首》,一是《记田间》,二是《怀郭小川》。他在编《秀露集》时,将写郭小川的这首诗,放到了《伙伴的回忆》中《忆郭小川》一文的结尾,遂使这份情义加重,远超了一般的朋友关系。

写作《颐和园》时,已是1987年,时间过去了整整十年,孙犁还在念念不忘那篇《伙伴的回忆》,又将遗漏情节做了补写。他在“芸斋主人曰”中说:“H、G谢世,余有悼文。时势不利,投寄无门。左砍右削,集内聊存。意有未申。此文乃补作也。”新中国成立之前,也即1949年天津解放前夜,郭小川、方纪、孙犁同在河北胜芳集结,进入刚刚停歇炮火的天津,共同创办中共天津市委机关报《天津日报》,并开党报创建文艺副刊先河,兼有新闻经历的三位文学家大,能有机缘并肩工作,实乃新中国文学与新闻事业一大幸事。

郭小川是新闻前辈,也是我崇拜的诗人之一。那个时期,我听到不少有关郭小川的传闻,对他的不幸去世心生惋惜。那时我已经在文艺部工作,读过孙犁的回忆文章,又自购了《郭小川诗选》,心中更添敬重。后来,我还看到不少怀念文章,讲到郭小川的经历,在天津日报社任编委兼编辑部副主任期间,他分管副刊科工作,在报社召开读者、作者会议时,他挎着盒子枪赴会,英气逼人。我年轻时喜欢诗歌,特别欣赏郭小川一张头戴鸭舌帽的照片,显得儒雅、倜傥,便也买了一顶鸭舌帽,请报社摄影记者为我拍照留影,引以为荣。1979年元月,《天津日报》“文艺周刊”复刊,时任主编的李牧歌与丈夫邹明,曾同为郭小川麾下,来自冀热辽的群众日报社。在郭小川逝世三周年、诞辰六十周年之际,李牧歌决意在“文艺周刊”组织一块主题专版,以尽缅怀之情。我随李牧歌来到孙犁家,向他请示并汇报。孙犁完全同意专版之事,叮嘱一定要编好、出好。

这块专版设计有“怀念诗人郭小川专号”栏版,刊发于1979年5月24日,以诗人遗作为主,并配发编者按,右上角位置便是诗人那张头戴鸭舌帽的照片。这期“怀念诗人郭小川专号”体现了新闻同仁对早期创办者的深切怀念,在报纸副刊界产生深远影响。1951年,郭小川从北京专程来津看望孙犁,在多伦多寓所的院里拍了几张合影。几十年过后,作家柳溪将我叫到她家中,让我辨识其中一张照片上的几位作家,我一眼就认出孙犁身边的郭小川,其时,诗人头戴一顶普通布帽,神态安然。2009年,《天津日报》创刊六十周年举办社史展,我特别将这块“怀念诗人郭小川专号”版面检索出来,制作成一块独立展板,与方纪、孙犁的展板一起,布展在《天津日